

北京市少数民族 人口增长和生育率变动分析

熊

郁

北京是全国唯一的包括56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最多的特大城市。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为49.85万,占全市常住人口979.36万人的9.1%。达到万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回族(29.64万)、满族(16.62万)和蒙古族(1.48万)3个民族;千人以上的有朝鲜族(3.9千人)、壮族(2.4千人)、维吾尔族(1.9千人)、哈萨克族(1.5千人)、土家族(1.2千人)、藏族(1千人)6个民族;百人以上的有苗族、彝族、白族、瑶族、布依族、黎族、侗族、纳西族、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锡伯族、羌族、裕固族14个民族;百人以下的还有32个民族。在地区分布上,这些民族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城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62.9%;另有29.2%分布于郊县,其中大部分是居住在民族聚居村(回族村46个,满族村44个)中的回族和满族人口;其余7.9%分布于镇上。

这种分布本身突出反映了京都的特点。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世居民族,如蒙古族、满族和回族;另一方面是新中国成立后,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相适应,在北京成立了多种民族的、宗教的机构和高等学院,以及陆续调入的民族干部和少数留京工作的民族高等院校毕业生。很显然,当前北京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规模是逐渐形成的。其变动状况如何,而主要的是其生育行为和生育观的变动是怎样的?对此笔者特作如下探析。

一、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动

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将近2倍。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动,受机械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民族变更)和自然变动三个因素的影响。北京市的情况也不例外,只是在不同时期,由于城市发展政策的差异,这三种因素对人口数量变动的影响是不平衡的。

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至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的11年中,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68.4%,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其中有的民族是从无到有;有8个民族年平均增长率在10~20%之间;世居的蒙古、回、满3个民族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3%和3.1%。这个阶段,各民族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普遍达到了安居乐业,促进了生育率的提高。再加上这期间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缺乏认识,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因而出现了北京市的持续高峰生育时期。此外,由于城市发展,民族人口迁入率增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53~1960年北京市净迁入人口达140万人。因此,这时期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快应是迁移与生育同时起作用的结果。

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1982年)的18年中,少数民族虽由52个增加到54个,而人口数仅增长13.6%,年平均增长率也下降到0.7%。这个阶段迁入人口较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所减少,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曾因政治原因迁出了大量人口,后虽大部分返回,但18年来迁移净增人口仅在10万人左右。这期间出生率下降也是人口增

长速度减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市1965年出生率已下降为22.95%，自然增长率为16.04%，到1981年出生率继续下降，自然增长率仅为10.0%。而全市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生育率较全市育龄妇女生育率还要低6.1%，总和生育率也比全市平均水平低0.11。

1982~1987年为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全市少数民族人口不仅在比重上有所上升（由1982年占全市人口的3.5%上升为1987年的5.1%），而且在人口数量上也增长了54.6%，其中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1~50%的就有6个民族，10~20%的有5个民族，世居的蒙、回、满3个民族也分别达到9.5%、9.9%和7.7%。很显然，这种增长速度决非自然增长所能达到的，其主要原因是民族政策落实，一部分过去填报汉族的少数民族个人或家庭“还本归源”，更改民族成份的结果。世居北京的3个民族人口增长状况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现象（见表1）。

二、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生育变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上述3个增长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增长了2倍，但如将1982年以来更改民族成份所带来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除外，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汉族（见表1），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市少数民族生育率的下降。据1982年人口

普查和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中国少数民族仍未摆脱自然的生育状态，总和生育率仍高达4.609。

其突出的特征是少数民族年龄别生育率分布分散，高峰生育期长，且峰值较高。少数民族年龄别生育率从15~49岁均有分布，其中100%以上生育率就占有20个年龄组，生育率达到200%以上的从22岁（230%）到32岁（207%）共有11个年龄组，其最高峰值达到353%。与这种生育模式相反，北京市少数民族妇女生育年龄则相对集中，处于峰值年龄的25~29岁组生育率也仅达到195.23%，24岁以下各年龄组生育率均低于全市水平，30岁以上则成陡坡下降。总和生育率不仅大大低于全国少数民族的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之下（1.50），而且还比全市的1.61低0.11，完全进入晚婚、晚育、少生的发达国家都市人口的生育模式（见表2）。

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模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变动，以及现行生育政策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大量调查

表1 北京市分年度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百人）

民族别	1987年	1982年	1964年	1953年	%		年平均增长%	
					1987/1982	1982/1964	1987/1982	1982/1964
总计	97 936	92 307	75 685	27 681	6.0	21.46	1.19	1.11
汉族	92 951	89 082	72 847	25 996	4.3	22.29	0.85	1.12
少数民族	4 985	3 225	2 838	1 685	54.6	13.64	9.10	0.71
占总计%	5.1	3.5	3.7	6.1	—	—	—	—
其中：								
蒙古族	148	94	85	69	57.4	10.59	9.50	0.56
回族	2 964	1 852	1 546	789	60.0	19.79	9.86	1.00
藏族	10	8	8	3	25.0	—	4.56	—
维吾尔族	19	8	7	2	137.5	14.29	18.89	0.75
壮族	24	18	9	1.5	33.3	100.00	5.92	3.93
朝鲜族	39	39	29	4	—	34.48	—	1.66
满族	1 692	1 167	1 133	809	45.0	3.00	7.71	0.16
土家族	12	2	0.6	—	500.0	233.00	43.10	6.92
哈萨克族	15	2	1	0.5	650.0	100.00	49.63	3.93

资料来源：1953年、1964年、1982年人口普查和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资料说明，文化程度的高低与生育胎次的多少成反比。其比例大致为：大学程度生育多胎为1，高中为3，初中为9，小学为27，即文

表2 1981年北京市少数民族育龄妇女分年龄组生育率 (%)

年龄组(岁)	合 计		市 区		郊 县	
	全 市	少数民族	市 区	少数民族	郊 县	少数民族
总 计	56.43	53.19	48.83	48.73	69.23	66.79
15~19	0.94	0.42	0.24	0.09	1.83	1.08
20~24	39.36	26.05	18.83	13.86	78.09	63.40
25~29	203.23	195.23	185.95	183.20	233.43	233.45
30~34	68.95	86.02	67.96	67.40	70.31	72.45
35~39	8.54	8.95	6.62	8.00	11.36	12.23
40~44	1.14	1.02	0.77	0.76	1.98	2.16
45~49	0.15	0.33	0.07	—	0.36	1.70
总和生育率	1.61	1.50	1.40	1.37	1.99	1.93

资料来源：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 and 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编制。

化程度每降低一个等级，生育多胎比例上升3倍。北京市是全国大城市中每万人拥有大学程度人口比例最高和文盲率最低的城市。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市每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者530人，高中1922人，初中3169人，小学2852人。少数民族人口除小学文化程度者比例略低于全市外，其它文化程度均高于全市和汉族的水平，同时也比全国和全国少数民族的水平高几倍甚至十几倍。以回族为例，每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低于全市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但却比全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比重高出近10倍（见表3）。

表3 1982年北京市每万人拥有的各种文化程度人口 (人)

	大学生	高中生	初中生	小学生
全 国	60.1	662.7	1775.0	3539.6
汉 族	62.0	672.0	1819.0	3577.0
少数民族	37.4	454.0	1223.0	3019.0
北 京 市	530.2	1922.0	3169.0	2852.0
汉 族	530.2	1917.0	3159.0	2860.0
少数民族	530.6	2085.0	3438.0	2687.0
其中：蒙古族	1728.3	2647.0	3126.0	1931.0
满 族	409.3	1943.0	3464.0	2837.0
回 族	363.8	2073.0	3535.0	2698.0
朝鲜族	3164.7	2758.0	2171.0	1561.0

资料来源：全国的根据《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
计算；北京市的部分引自《中国人口·北京分册》。

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近30年间北京市回族人口的文化程度增长比较明显。如回族聚居的宣武区牛街回族人口，1953年每千人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31人，初中文化程度的也只有30人，绝大多数是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1982年每千人中大学文化程度者达到了28人，高中226人，初中346.2人，分别比1953年增长了2.37倍、8.7倍和10.5倍。198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对牛街回族集居的5个居委会150名妇女的调查表明，具有大学（包括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11.33%，高中为30.67%，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又有了大幅度的上升。牛街地区文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冲击着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传统习俗，早婚早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目前牛街回族青年男女基本上实现了晚婚。1953年与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对比，15~19岁组未婚比例，男性由37.1%提高到100%，女性由26.7%提高到98.6%；20~24岁组男性由17.6%提高到98.7%，女性由4.2%提高到87.4%。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资料更进一步表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初婚年龄一般都推迟到25~28岁，而小学以下的妇女初婚年龄，20岁以下的占47.8%，到24岁几乎全部完婚。

（二）家庭结构与规模的变化。城市家

庭结构的小型化，家庭成员间内向凝聚力的减弱，是家庭经济功能变化的必然反映。城市家庭已基本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是一个消费单位。人们的职业主要服从于社会生产分工，因而家庭成员大多从事不同职业，一般不需要在家庭中进行职业的合作，这在客观上已没有建立大家庭的必要。加之城市住房条件拥挤，也限制了大家庭的存在。仍以宣武区牛街回族人口为例，近4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家庭经济功能的变化，家庭规模、结构以及家庭的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合家庭和直系联合家庭逐步解体，两代家庭大幅度增加，3代及3代以上家庭虽然在比重上还略有增加，但家庭规模明显缩小。调查资料表明，1953年平均每户为5.52人，其中3人以下户占全部家庭户的28%，7人以上户占30.6%；1982年平均每户人口降到3.69人，比1953年下降了1/3，其中3人以下户所占比重达到了51.7%，7人以上户仅为7.1%；1989年调查，3人以下户又有所上升，为85%，4~6人户略有下降，7人以上户基本持平（见表4）。生活在这一变化的城市家庭中的人们，特别是在核心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一方面割断了大家庭所特有的“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的承袭，摆脱了多生多育模式的制约；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更新，对子女的期望

已不再是撑门户、壮势力的数量追求，而逐渐转变为以培育高素质的后代为目的的有节制的生育意愿。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调查，占调查人数26%的20~30岁妇女，有66.7%的人生活在3人以下的家庭，18%的人生活在4~6人的家庭。她们中89.7%的人只生育过1胎，还有10%的人则还未生育或不生育。这充分说明，家庭因素对生育意愿的转变将是城市生育变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三）生育政策的影响。生育政策在生育变动中具有关键作用。经过对计划生育政策十余年的宣传、教育和实践，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家庭、个人和子女的生活方式、目标追求等价值观念的相应变动，计划生育政策已为全社会所接受，以少生优生为特征的现代生育模式正在形成中。

近40年来北京市的少数民族人口与全市人口一样，由毫无计划的状态而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与此相适应，生育观也必然发生变动。众所周知，生育观和生育行为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与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社会、经济、习俗、宗教等密切相关，特别是民族的自我生存意识与宗教文化，至今仍在部分民族中产生影响。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使各民族本能地要求多生，以壮大自身的力量。这种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强大的民族与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大大超过了一家一户传宗接代的目标追求。这种价值观念不是直接形成生育观来控制生育行为，自发地起导向作用的，而是被纳入宗教文化，在神圣的教义里普遍地、严格地将生育行为订入教规，任何人都不得违背。比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为了繁衍本族人口，实行“民族内婚”制，即一般不与外民族通婚，特别是禁止本民族妇女外嫁他民族。据调查，北京市各民族间相互通婚现象近年有所增多，但回、汉族通婚后所生子女中，绝大多数填报回族成分，可见这与本民

表4 北京市宣武区牛街回族
人口家庭规模构成 (%)

家庭规模	1953年	1982年	1989年
1~3人户	28	51.7	58
4~6人户	41.4	41.2	33.3
7人以上户	30.6	7.1	8.7
平均每户人口数	5.52	3.69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调查资料编制。

族生存与发展的潜意识有很大关系。此外，早婚多育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社会习俗，而且得到教规肯定。《古兰经》有女9岁、男13岁就算成人，阿訇可为其主持念经完婚，生儿育女乃真主所赐等规定。在这种民族意识与宗教文化影响下，回族历史上的生育欲望是较强的。据1988年资料，北京市牛街地区60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23。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表明，50岁以上的妇女中，有81.63%选择的生育数量在3胎以上。与此相反，20~40岁已婚妇女，除6.02%生育为零外，93.98%的妇女均生育1胎。

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所包含的生育观念，长期以来规范着他们的生育行为，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宣传教育和积极贯彻，民族聚居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民族政策的调整与贯彻，以及少数民族居住地周围大环境里新的生育观的形成，逐渐冲破了宗教生育观的禁锢，于是计划生育政策也被少数民族所接受。目前北京市少数民族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已成为生育变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据1982年北京市抽样调查，67岁组和61岁组老年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19.57岁和19.78岁；51岁组的平均初婚年龄

仍为19.65岁；41岁组的平均初婚年龄已上升到22.17岁；31岁组平均初婚年龄则超过23岁，其中城市高达24.6岁。抽样调查资料还表明，67岁组妇女终身生育率为5.1；35岁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其中城市妇女已减少到1.59个。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调查的牛街地区晚婚率为92.85%，计划生育率达到99.95%以上，独生子女领证率高达99.98%。目前牛街30~40岁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07个，30岁以下减少到1个。这充分说明，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生育变动的重要因素。

由上可知，在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变动中，经常起作用的是由生育率变动导致的自然变动。而考察生育率的变动时，应重视生育观念的研究，并要注重对影响生育观变动的文化教育、家庭社会、经济政治等综合变量进行深层次的动态分析。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少数民族人口变动过程及其发展趋势，并据以制定符合实际的、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繁荣发展的生育政策。（本文责任编辑：洪映）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繁荣人口科学，促进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发展，全国8家报刊联合举办 “人口与计划生育论坛” 征文启事

为了便于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我国现实人口问题的研究，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与实践的深入发展，繁荣中国人口科学，《中国人口报》社经部、《人口研究》编辑部、《人口与经济》编辑部、《人口动态》编辑部、《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人口与优生》编辑部、《南方人口》编辑部、《西北人口》编辑部联合举办全国性“人口与计划生育论坛”征文活动。具体办法如下：

（一）征文范围：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理论探讨，从不同角度，以各种内容，对我国现实人口问题的广泛研究与思考。

（二）来稿起止日期：自1990年3月1日起，至1990年11月30日止（以稿件寄出时间为准）。

（三）每篇文稿以8000字为宜，要求立意新颖，观点明确，结构严谨，文字通畅。来稿请只投寄一家报刊，切勿一投多投，并注明“人口与计划生育论坛”字样。

（四）评委会由知名人口学家和有关部门领导组成。在1991年第1季度评出一、二、三等奖及荣誉奖。

《中国人口报》社经部 《人口研究》编辑部 《人口与经济》编辑部
《人口动态》编辑部 《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 《人口与优生》编辑部
《南方人口》编辑部 《西北人口》编辑部 1990年5月